

独支木难

元丰八年（1085）三月，神宗逝世。他未满十周岁的儿子赵煦继位，是为哲宗。

闻知这一消息后，王安石写了两首《神宗皇帝挽词》，其一道将圣由天纵，成能与鬼谋。
聪明初四达，俊义尽旁求。
一变前无古，三登岁有秋。
讴歌归子启，钦念禹功修。

这首《挽词》的前六句，全是歌颂神宗在位十八年间，在变法改制方面所建立的业绩，最后一联，则是寄希望于新帝能把父辈的改革事业继承下去。

天不遂人愿。

实际当政的是高太皇太后，素来看不惯激进的神宗与安石，看不惯变法。她倚重同样反对新法的“司马牛”（光举如牛）、文彦博、吕公著，拜为宰辅大臣。尝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摯、范纯仁、李常、苏轼、苏辙等人，亦被召回朝中任职。

安石陷入了极大的忧惧、愤懑、苦痛之中。时时以手抚床，高声叹息，夜不能寐。亲朋见其如此，便尽可能不使他听到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些举措，但无计长久隐瞒。当他获悉废罢市易、方田均税和保甲诸法时，还能强作镇定，及知募役法也要废罢，愕然失声道：“此法终不可罢！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，无不曲尽。”

普遍的观点认为，变法的失败，在于其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。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，没有适应的土壤；“敛财”的实质，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；急于求成却执行不力、用人不当；旧党拼命打压，新党内部又分裂……

从“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，无不曲尽”这点可以看出，变法“操之过急”的说法，不完全成立。招财进宝的心愿亦非原罪，取之有道、取之有度即可。问题在于，安石的经济思想虽有闪光成分，但他的经济改革在实践上某种程度的脱节，致使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。生活在基层几十年、历任地方官员廿余载，安石深知国情，久谙民俗，看透了官僚主义的恶习和弊端。

他认为积累、消费要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，“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财；取天下之财，以供天下之费”。强调“理财”，“一部周礼，理财居其半”，“减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”，“度世之宜”。在地方从政实践中，他曾主张改革茶、盐专卖，由商人自由销售，政府收税，主张在流通领域减少或削弱行政干预。他对商品经济的态度，对待人的物质欲望的态度，都较同时代人要开明得多。然而，从总体的角度考察新法，非但没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，相反倒是仍在强化这种干预。地位的变化，从政方向的变化，使王安石主持改革大局后，实施方针与他原有的经济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偏差。

熙河开边（又称河湟开边）之举，若能贯彻始终，安知未能开辟一番大宋新气象？熙宁年间，在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下，王韶任前线军事指挥，最终收复了宕、叠、洮、岷、河、临（熙）六州，堪称大捷，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。邓广铭认为，对待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的契丹、西夏，王安石都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规划和筹策。提出吞灭契丹、西夏的建议，绝非“梦幻语言”，而是高瞻远瞩。邓广铭更以淝水之战为例，表示北宋的王安石比之东晋的谢安石（谢安，字安石），尤有胜之。

而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享受到的“非常相权”，虽使宋代立国以来相对完善的君相制衡格局开始倾斜，却也被一些历史学者认为，“在宋代政治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”，这种意义必须从正反两方面去理解。正面的是：它象征了士大夫治天下的权

高太皇太后，素来看不惯激进的神宗与安石，看不惯变法。

